

# 西夏京畿的佛教文化

杨志高

(宁夏大学 西夏学研究中心,宁夏 银川 750021)

**摘 要** 西夏是佛的国度。西夏京畿是西夏王朝佛教文化的中心。西夏立国近二百年间,在这里留下了大量佛教文化的遗迹和遗物。西夏京畿特殊的人文、自然环境,为党项政权佛教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皇室的倡导,帝师国师等高僧参与,西夏京畿成为佛经译印中心,由于藏经佛事的需要,西夏京畿成为皇家寺院中心,众多的佛教文献文物精品,展现了西夏京畿独特的佛教文化艺术价值。众多的遗存连同传世的相关文献,为西夏京畿的汉传、藏传佛教文化,乃至整个西夏佛教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西夏京畿对于藏传佛教的东传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西夏 京畿 佛教文化 佛经翻译刻印 皇家寺院 文化艺术价值

**中图分类号** K24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491(2006)01—0058—06

佛教文化是西夏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西夏立国近二百年间,由于历代西夏皇帝对佛教的崇奉、推行,佛教文化代替了党项原始文化而成为西夏宗教文化的主流。西夏京畿所在地——宁夏平原和贺兰山成为当时西夏五大佛教文化据点的中心区,留下了大量佛教文化的遗迹和遗物。自上世纪下半叶以来,在贺兰山东麓发现多处西夏佛塔石窟和佛教文献文物。这些遗存连同传世文献,为西夏京畿佛教文化,乃至整个西夏佛教建筑、艺术、印刷出版和多民族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也为宁夏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宗教旅游、生态建设提供了人文资源和经验借鉴。

## 一、西夏京畿与佛教文化的形成

### (一)佛教在西夏兴庆府根植的人文优势

兴庆府作为西夏军政、文化的中心,是中央官署所在地,皇室贵族、臣僚百官集聚,辽宋金吐蕃等国使节往来。因此就近新建高规格服务于皇室及国家重大佛事活动的塔寺,作为讲经、译场和刻印之所,是京畿官员尤为用心,更不能马虎的事。

兴庆府所处的宁夏平原,黄河襟带东南,贺兰山蹲峙西北,地势平坦,经济发达。位于平原中部的首都,成为区域性的都市,也成为党项族和汉、回鹘、吐蕃、契丹等众多民族集聚以及文化交融的重要地区。史载,李继迁攻取灵州时,“尽逐居民城外,数万百姓

皆徙怀远”<sup>[1](卷10 P120)]</sup>。在这些民族或以他们为主体建立的宋、吐蕃、辽等政权中佛教文化成为其民族、国家崇奉的主流。因此,对西夏来讲,在一定程度上,宗教成为维系各民族关系的共同文化——心理基础。

此外,西夏立国的 10 至 13 世纪,正是中国历史上多国并存,民族战争频繁的阶段,也是佛教在中国北传以中原、吐蕃为中心的两大系统新发展和新传播时期。为了巩固、维护新兴政权,除军事、经济手段外,数百年受命于中原王朝、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党项贵族,还必须借助宗教。元昊通晓佛学、汉文,又受其父德明崇佛的熏陶。因此,以息心去欲、清静善性为劝世宗义的佛教,理所当然的成为西夏开国者宁邦御民的主要治国方略。

### (二)西夏人继承了唐五代禅僧在贺兰山修契的传统

贺兰山,有多种称呼,西夏语称之为“兰山”<sup>[2]</sup>,位于宁夏平原西北部,其东麓与兴庆府相接。南北长约 200 公里,东西宽 15-30 公里,海拔 2000 余米,为平原的天然屏障。山之东麓分布有众多的东西走向的沟谷,各沟南北地势平坦,地理、生态环境优越。“冬夏降雪,有种种林丛,树果、蕨萁及药草,挡风蔽众。”<sup>[3](P88)]</sup>由于气候凉爽宜人,林木树果茂盛,加之重岩叠嶂,清泉长流,环境幽雅,很早成为禅僧修契胜地,也便于信众进香和避暑。据《宋高僧传》载,唐、五代时

收稿日期:2005—10—20

作者简介:杨志高(1964—),男,甘肃庄浪人,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夏学。

就有新罗国王子无漏、增忍等多位僧人入驻贺兰山修道。<sup>[4](P846 P877 P889)]</sup>到宋咸平五年(1002)时,李继迁攻陷灵州,党项族随即占据贺兰山。天禧元年(1017)“夏,龙见于温泉山。山在怀远镇北。德明以为瑞,遣官祀之,于是有迁都之意”<sup>[1](卷18 P118)]</sup>。定都立国后,随着统治者大力推行佛教文化政策,奉贺兰山、积雪山、焉支山为三大“神山”,贺兰山则为“神山”之首。<sup>[3](P58-59)]</sup>西夏王朝在这里大兴土木,建寺院、修离宫、驻军营,把它作为与京畿相呼应的又一山林佛教场地和皇家林苑、军塞要地,成为与兴庆府相媲美的国家活动的区域。

可见,佛教文化在西夏京畿地区的兴盛是与这里的人文地位、自然环境紧密关联的。

## 二、西夏在京畿发展佛教文化的措施、政策

佛教文化在西夏深受上自皇室达贵,下至平民百姓至极尊崇,影响深远,这应归功于西夏历代帝王身体力行的倡导,尤其是开国皇帝元昊和第五代仁孝的开拓性措施、政策。

### (一)西夏前期在京畿及全国的佛教文化举措

第一,向宋王朝请赐佛经。史载,从宋朝赎请佛经始于西夏建国前德明时期。到宋景祐元年(1035)十二月:“癸酉,赵元昊献马五十匹,以求佛经一藏,诏特赐之”<sup>[5](P12)]</sup>。请赐佛经,为佛经翻译提供了底本。

第二,延揽、重用回鹘等族高僧,对请赐汉文佛经以新创制的西夏文进行翻译。元昊“新起兴礼式德。戊寅年中(1038),国师白法信及后稟德岁臣智光等,先后三十二人为头,今依蕃译”<sup>[6](P66)]</sup>。国师白法信和白智光是回鹘人。回鹘僧是当时乃至西夏前期主要的译经僧人。

第三,为葬佛舍利和贮藏佛经,在京畿等地进行大规模的建寺修塔。佛塔寺院是佛教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佛经翻译、贮藏保护、刻印说法的重要场所。塔是寺院的标志。元昊时“致东土名流,西天达士,进舍利一百五十斛……馨以银椁金棺,铁匣石匱……下通掘地之泉,上构连云之塔”<sup>[7](卷二 P44-45)]</sup>。其后又下令建高台寺“贮中国所赐大藏经”<sup>[1](P8-9)]</sup>。

第四,钦定每年四季之孟朔日为官民礼佛的圣节。元昊所采措施为佛教在西夏京畿进一步流传打下了坚实基础。元昊之后86年间,无论是谅祚、秉常、乾顺亲政,还是没藏氏、梁氏姑侄三位母后听政,统治者都延续了上述政策。这期间,西夏又先后向宋请经4次。其中谅祚时则达3次之多,秉常时请经1次。经过6次请经,6部《开宝藏》传入西夏。当时,西夏除得到大量汉文佛经外,还有小部分的藏文、梵文佛经。现存的西夏文佛经卷首有译者题名的,主要在秉常、乾顺

时期。到乾顺时期,已译就了362帙、820部、3579卷的西夏文佛经,形成了《西夏文大藏经》的主体。没藏氏听政时建承天寺塔贮藏其中,并“金棺银椁瘞其下,佛顶舍利闕其中”<sup>[7](卷二 P4)]</sup>。谅祚朝还在兴庆府南今宁夏中宁县建安庆寺。秉常时在西夏贺兰山拜寺沟建修方塔寺院。乾顺时虽在河西走廊修建凉州感通塔寺、甘州卧佛寺,但就整个西夏来看皇家佛教建筑主要在京畿地区,河西走廊西夏石窟寺和大量佛事主要属重修前代、地方所为。

### (二)西夏后期的佛教文化举措

第一,向金购买佛经,并请藏传佛教高僧来京畿传法。史载,天盛六年(1154)夏使金大臣“九月辛亥朔,夏谢恩,且请市儒、释书”<sup>[8](P1402)]</sup>。当时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已有较大的发展,随之西夏京畿与吐蕃高僧也有了直接的宗教文化交往。仁孝请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初祖法王都松钦巴到西夏传法。后来噶玛噶举派和萨迦派的高僧藏索哇、迦巴瓦国师党本来到西夏被奉为上师,传授、翻译藏传佛教经籍。<sup>[6](P52-53)]</sup>

第二,对西夏文佛经进行校勘的同时,还传译了很多藏传佛教经论。随着《西夏文大藏经》在前期的完成,仁孝时敕令把译就的佛经与宋《开宝藏》、辽金的《契丹藏》或《赵城藏》进行重校。此外,一些藏传佛教的经典被译成西夏文、汉文。

第三,颁行《天盛律令》,其中规定了僧人、寺院等方面系统、详细的制度。从管理机构看,中央次等司设有僧人功德司、出家功德司,地方寺院直接由功德司领导,设有寺僧正、副、判、检校等职。赐衣封号制度,既继承了中原传统,又有发展。在赐紫、赐绯基础上,增加了赐黑、赐黄制,形成由高到低四个等级,僧人的封号有上师、国师、大师、法师、禅师、忠师、信师等复杂体系。特别是到仁孝后期,又首次封设最重要,也是最高的“帝师”。波罗显胜、慧宣等吐蕃高僧先后被仁孝封为帝师。《律令》还规定担任僧官必须要读诵占半数藏文经咒在内的十多种经咒,还要由通藏文者考试。规定佛殿、星宫、神庙、内宫等以外,官民屋舍不允许装饰大朱、大青、大绿,保护寺院等等。

第四,频繁举行各种大法会,刻印散施大量佛经。西夏前期举行大法会的资料较少。仁孝时值先皇故去、皇太后周忌之辰、本命之年等,皇室举行了大规模的法会活动,并刻印散施大量佛经。据统计,仁宗时期京畿大的法会有8次之多<sup>[9]</sup>,印施番、汉文佛经几千卷、几万卷、十几万卷、二十几万卷不等。一些御制发愿文记载了在大法会上“念佛诵咒,读西番、番、汉藏经”、“度僧西番、番、汉三千员”<sup>[6](P53)]</sup>。把西番(吐蕃)经、僧列于首位,可以看出对吐蕃佛教、吐蕃僧人的重

视。

仁孝时期,藏传佛教势力在西夏京畿得到了扩大。仁孝以后三十多年中,虽然朝政五次更迭,并与宋金蒙古频繁交恶,但西夏皇室崇信佛教信念、政策没有改变和减弱,他们仍举行规模盛大的法事,建筑佛塔寺院,以祈求佛力保佑而使国祚延续。襄宗应天四年(1209)散施佛经并作广大法事,烧施道场等1758遍。<sup>[9][P74]</sup>。现存西夏后期京畿地区的佛塔,虽不能确定其具体年代,但从建筑风格上反映出在中原基础上已吸收了藏传佛教艺术,有的甚至来源于藏传佛教。贺兰山拜寺口双塔、兴庆府北宏佛塔虽沿袭宋金制度,但其塔顶和塔身上部分别出现藏传佛教覆钵式塔刹、覆钵式塔样。覆钵式、等腰三角形排列的108塔则源于藏传佛教。<sup>[10][P23 P306-310]</sup>。

三、西夏京畿成为翻译、刻印佛经的中心和皇家寺院的中心

#### (一)京畿成为翻译、刻印佛经的中心

1. 以京畿为基地,西夏译成《西夏文大藏经》,还传译了藏传佛教经论仪规。这些佛典又由兴庆府流布全国各地。

在佛经翻译详勘过程中,有西夏多位皇帝、皇后亲自挂帅,众多寺院高僧承担了实际的翻译、刊印重任。他们中既有御封帝师、国师,还有其它一般僧人。特别是回鹘僧、吐蕃僧为西夏文佛经的翻译、集结,做出了重大贡献。

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前扉画《西夏译经图》形象地描绘了西夏秉常及其母梁太后亲临译经场及国师回鹘僧白智光主持译经的情景。《悲华经》、《佛说宝雨》等经卷首题款分别有“天生全能、禄番祐圣、式法皇太后梁氏御译,就得主世、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嵬名御译”,“胜智广禄、治民集礼、德盛皇太后梁氏御译,神功胜禄、习德治庶、仁净皇帝嵬名御译”。文中“大明皇帝”、“仁净皇帝”即为秉常和乾顺皇帝。<sup>[6][P72-73]</sup>还有不少佛经题款有“××皇太后御译”、“××皇帝御译”、“××皇帝御校”、“××奉敕译”、“××令依蕃译”。在这些文献中,以秉常、乾顺时期为最多,说明这两朝是西夏译经的重要时期。

在仁孝及西夏后期可考的5位帝师、24位国师中,有7位直接参与了佛经的传译,多位为吐蕃高僧。<sup>[6][P39-40]</sup>他们不仅独立、合作翻译了采自汉文、藏文的经、律、论三藏,而且有的还自撰了佛教著作。仁宗时的藏族高僧贤觉帝师《忏罪千种供养奉顺中已集当许文》为兰山智明国师沙门德慧译成。大乘玄密帝师精通佛教显密教法,为噶举派著名祖师米拉日巴的再传

弟子。他所传著《解释道果语录金刚句记》,为北山大清凉寺沙门慧忠译就。兰山觉行国师沙门德慧(后又被封为智昭国师),仁宗时曾奉敕译传《圣佛母般若心经持法要论》、汉文《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七佛所说神咒经》、《忏罪千种供养奉顺中已当许文》等。兰山通圆国师沙门智冥在仁宗时集经汉文《四分律行事集要显用记》。大度民寺的藏族僧人觉照国师狮子,传作了《魔断问答要论》、《道之中禁绝顺要论》、《金刚王亥母随处施食奉顺要》、《中有身要论》、《死亡回拒要论》等多种要论。大度民寺的慧照国师,曾作《双供顺略集要语》。大度民寺的法显国师鲜卑宝源,曾重校《金刚经》。

纯祐时,贺兰山北五台山大清凉寺慧真和甘泉狮子峰诱生寺智广共同编集了由兰山崇法禅师沙门金刚幢所译汉文密典《密咒圆因往生集》,中书相贺宗寿为其作序。

2. 由于大量佛事活动所需,京畿成为刻印施经的中心。

京畿以政府部门刻字司、皇室寺院为主的官刻和私刻为满足僧俗民众的佛事需要,印施了大量佛经。刊行形式有木刻本、活字本、写本等几种。仁宗时印经次数多、数量大、质量高。刻字司不仅刻印佛经,也刻印世俗文献。乾祐十五年(1184)是仁孝本命年,仁孝“仍敕有司”印造《圣大乘三归依经》西夏文、汉文51000余卷,彩画功德大小51000余帧。<sup>[6][P74]</sup>皇家寺院则承担了大量的印经任务。出土大量木雕版的宏佛塔所在寺院是一处皇家印佛经的重要场所。一些发愿文记载,西夏皇室印刷散施佛经,数量动辄数万,甚至几十万。纯祐时罗皇后不仅发愿抄写全部《西夏文大藏经》,而且还在大度民寺大法会上,散施番、汉文佛经,计25万卷。<sup>[11][P71]</sup>私刻中有达官贵人,也有一般百姓。仁孝时权臣任德敬曾施经发愿求佛速愈疾患。<sup>[12]</sup>

#### (二)京畿成为皇家寺院的中心

西夏京畿不仅有众多的皇家寺院,还有其它普通寺院。经蒙元对夏战争,毁坏甚多。仅分布在贺兰山的寺院到明代时,已为“颓寺几百所,并元昊故宫遗址”<sup>[7][卷一 P12]</sup>。迄今整个京畿西夏佛教建筑除佛塔留存外,其它寺院仅见佛经题记和方志片言记载中。从这些挺拔高耸、有很高的艺术成就的西夏佛塔和文献记载中,仍然可看出当时西夏京畿皇家寺院的气魄。

##### 1. 佛塔、石窟寺等文物古迹

拜寺沟双塔,双塔位于拜寺沟沟口北侧台地。两塔东西相距80米,同为13级、35米左右八角密檐砖塔。塔区周边台地均有大面积的佛殿建筑。1986年文物部门对双塔进行维修。根据塔内发现的西夏文字和



在双塔周围采集到的宋代钱币及绿色琉璃瓦等带有西夏时代特征的建筑材料,推断双塔似建于西夏中晚时期。<sup>[10]</sup>出土绢质彩绘佛画、佛像等。从双塔地面残存大量与西夏陵相似的建筑残件,说明这里曾是西夏等级很高的皇家寺院。

拜寺沟北寺塔群残基:北寺塔群残基处于双塔北侧山坡。1999年,考古队对其进行发掘,发现为62座西夏僧侣墓塔所在地。塔群残基大致呈三角形排列在山坡10层台地上,平面形制有54座为十字折角形(即覆钵式),其余是八角形和方形。出土文物中,最具特色的当数泥制小塔——彩绘法身舍利“擦擦”。<sup>[13]</sup>

拜寺口方塔:方塔位于距拜寺沟口10公里处,为13层、高约30米的密檐式实心砖塔。同双塔区一样,在方塔周围有约10万平方米的台地也是大型佛教建筑遗址。1991年,对方塔废墟清理,发现了西夏文、汉文佛经、仁宗发愿文、世俗汉文诗集、塔心柱题记、印花、贴花和绣花的丝织品、骨灰和舍利子,以及小泥塔婆、小泥佛“擦擦”等10多个种类20万字的珍贵文物。其中有产生重大影响的西夏文译藏传密教《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也有汉文藏传佛教经典《初轮功德十二偈》等。方塔成为现知唯一有明确纪年的西夏早期古塔,年代为大安二年(1075)。塔心柱题记载了秉常和其母发愿建塔的史实<sup>[14] P340</sup>。从仁宗发愿文和沟南遗址散布的绿色琉璃瓦当,证明方塔寺院也与西夏皇族有关。

承天寺塔:上文已提及。原塔寺毁于清乾隆时的大地震,今存塔重新建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整个院落以寺塔为中轴线,呈长方形布局,塔为砖砌八角十一层楼阁式塔,总高64.5米。该塔为谅祚母后没藏氏动用数万军民,历时近六年倡建的“承天顾命”舍利塔。塔寺完工后,“延回鹘僧登座演经,没藏氏与谅祚时临听焉”<sup>[1] 1卷 19 P226</sup>。

宏佛塔:位于今银川市北十余里处的贺兰县境内,残高27.24米,塔身下3层为楼阁式,上为覆钵式,是传统中国楼阁式建筑与喇嘛塔相结合的复合式空心砖塔(花塔)。1990年对该塔进行拆修时发现西夏时期的大量遗物,计有藏密绘画雕塑54幅(件)、西夏文木雕板2000余块等。其中绢质彩绘有大日如来、菩萨、护法金刚等藏密形象。夯土地基内发现大量绿色、黄色琉璃建筑构件和雕板残块说明宏佛塔所在寺院也曾是一座等级很高的皇家寺院,同时说明此塔寺也是西夏雕版刻印场所。<sup>[15]</sup>从西夏文经版、西夏独具的掌纹砖等珍贵文物可知,该塔始建于西夏晚期,清朝曾做过修葺。

一百零八塔:位于今银川市南数十里处的青铜

峡峡口黄河西岸山坡。每座覆钵式塔由上至下按一、三、三、五、五、七、九、十一、十三、十七、十九的数目排成三角形塔林。出土记有西夏文的帛画。<sup>[16]</sup>

此外,还有位于平罗县姚伏镇的田州塔、中宁县鸣沙的安庆寺塔。前者平面呈六角形,高七层,空心筒壁结构。底层塔身施以砖雕斗拱、椽飞、瓦垄构成的塔檐,其余各层为砖叠涩檐。塔顶呈六边覆斗状。后者又见《嘉靖宁夏新志》“寺内浮屠相传建于谅祚之时”<sup>[6] P236</sup>的记载。银川市内海宝塔(北塔),也是西夏时期使用的前代建筑物。

贺兰山山嘴沟现存四座石窟寺,或开凿于悬崖,或利用自然山洞修整而成,残留壁画有六臂金刚、护法力士、佛、上乐金刚和说法图等。从地表残存西夏手掌印纹砖和明人游记来看,此处石窟可能和西夏有关。<sup>[17] P82</sup>随着对山嘴沟石窟壁画的初步分析,说明这是西夏京畿有西夏壁画的石窟寺。<sup>[18] P49</sup>

另外,在贺兰山北端的大枣沟内发现崖刻古塔5座,涝坝沟口刻塔2座。苏峪口、汝箕口也有两处摩崖造像。在贺兰山各沟口总共11个地点的岩画中还发现西夏岩刻佛塔26座以及佛头像和西夏文“能昌盛正法”、西夏文“佛”题记。<sup>[19] P89-92</sup>

## 2. 文献记载的寺院、佛塔

西夏五台山寺,位于贺兰山,仿宋五台山寺而建,又称为北五台山、北山、清凉寺等。西夏后期汉译藏传密教经典《大乘要道密集·解释道果语录金刚句记》篇首题款、《密咒圆因往生集》题记<sup>[20]</sup>、敦煌莫高窟444窟窟柱题记分别有:“北山大清凉寺沙门慧忠译”、“北五台山清凉寺出家提点沙门慧真编集”和“北五台山大清凉寺僧沙口口光寺主……”等内容<sup>[6] P118</sup>。可见,西夏五台山已有汉密、藏密僧人。五台山本位于山西,是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相传为文殊菩萨示现之处。西夏建国前后,德明、元昊时就曾派使者到五台山“修供十寺”,或“供佛宝”。后来由于夏宋关系紧张,西夏就在自己境内的贺兰山中建立起朝奉的五台山寺,成为“菩萨圣众现生显灵、禅僧修契、民庶归依处是善宫,野兽见人不惧”<sup>[3] P58</sup>。明初安塞王朱樗斋有咏拜寺口诗:“文殊有殿存遗址,拜寺无僧话旧游”<sup>[7] 卷一 P17</sup>。据此,西夏五台山似应在拜寺沟内。

佛祖院,位于贺兰山。夏末元初,曾在这里修行的党项族僧人李慧月在杭州施印大量佛经。今存西安市的《华严经》卷末的西夏文题记中有“番国贺兰山佛祖院摄禅园和尚李慧月……”<sup>[21]</sup>。

慈恩寺,在贺兰山石台岩云谷。夏末元初,该寺中一行沙门慧觉曾为重刻本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

作序,并编集《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四十二卷。〔6〕〔P119〕

“连云之塔”,上文已提及,位于兴庆府。据《嘉靖宁夏新志》卷二《大夏国葬舍利碣铭》载,元昊时钦崇佛教“禁苑蓬宫,悉心修饰;全乘宝界,合掌护持……”。

戒坛寺,在兴庆府。《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二载,元昊之妃没藏氏曾在此出家为尼,号没藏大师。

高台寺,在兴庆府东。史载“该寺,城东十五里,夏废寺,台高三丈,庆恭王重修之,下有大湖千顷,山光水色,一望豁然”〔7〕〔卷一 P54〕。1987年,在银川市东郊区发现长30多米的砖砌下水道、砖砌墙基、地面,并出土与西夏十三号陵东碑亭所出土完全相同的建筑材料及生活器皿。〔22〕经研究推证,这便是元昊时西夏皇家寺院高台寺遗址。

大度民寺,是兴庆府的一所皇家寺院,它可能和高台寺遗址有关。在仁宗乾祐年间,这所寺院中传习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有党项国师与吐蕃国师〔21〕。史籍记载的大度民寺的国师有上文提及的法显国师鲜卑宝源、慧照国师、藏族僧人觉照国师法狮子。大度民寺在乾祐二十年(1189)时,举办仁孝继位五十周年庆典大法会。法会恭请宗律国师、净戒国师、大乘玄密国师、禅法师等重要僧人参加,诵读散施大量藏文、西夏文、汉文佛经,作各种法事长达十昼夜。〔9〕

#### 四、西夏京畿独特的佛教文化艺术价值

《西夏文大藏经》是除藏文佛经外,我国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大藏经,也是西夏人与中原汉民族、吐蕃等民族佛教文化交流的产物。西夏佛塔出土的国宝级、精品类佛教文献文物,已超越了它们本身的宗教含义,具有重要的文化艺术价值。

(一)从佛经文献看,方塔发现的九册《吉祥遍至口合本续》是夏译藏密经典。经牛达生先生研究,从印本中一些倒字等现象说明它是采用木活字技术印刷而成。它不仅是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重要资料,同时,“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实物,它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艺具有重大价值。”〔11〕〔P24〕

(二)从版刻实物看,宏佛塔所出2000余西夏文雕板残块,是研究西夏和中世纪印刷的宝贵资料。雕板残块有单面版,多为双面版。按文字大小分为三类:大号字版仅7件,最大的一件作蝴蝶装,上下单栏,左右子母栏,高13厘米、宽23.5厘米、厚2.2厘米;版心

为白口,上半有书名简称,每半面6行,每行12字,字见方1.2厘米左右。中号字的最多,约占50%以上,最大的两件皆为经折装。小号字者约占40%以上,多为双面版。〔23〕

(三)从佛教艺术看,各塔所藏佛画、雕塑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方塔、宏佛塔、拜寺口西塔、108塔出土的佛画有木版画、卷轴画、捺印画等,题材有中原和吐蕃风格。如方塔所出顶髻尊胜佛母版画高55、残宽10余厘米,为塔幢形。佛母结跏趺坐,三面八臂,呈现出不同的神态,手拿各种法器。宏佛塔有绢质卷轴画13幅,内容有阿弥陀来迎、观音、大日如来、炽盛光佛等。在一幅炽盛光佛画上主尊居中,结跏趺坐于仰莲须弥座上,施说法印,身着红色右袒袈裟。主尊上方绘黄道十二宫、祥云和星宫图。左右两侧及下部绘九曜星宫图,整个画面内容丰富,布局严谨,线条流畅自如,晕染适度,设色艳丽。〔14〕〔P38-39〕

此外,这些塔中还出土了造型优美的彩绘泥塑造像、木雕菩萨、女伎像和上乐金刚等。

(四)塔藏大量模制小泥佛、小泥塔——“擦擦”更具特色。“擦擦”主要出土于方塔、宏佛塔、北寺塔群和108塔中。多则1100个,少则几个、几十个、几百个。如方塔中的模制小泥佛“擦擦”,背部多呈偏平,有的是三角形,有的为半圆形,佛结跏趺坐,头有高肉髻,作禅定印。北寺塔群的小泥塔“擦擦”,上部脱模,下部手制。脱模者多刷金粉,手制者则用彩绘。“擦擦”多用模具挤压脱模后,或晒干,或烧制而成。它们既是一种舍利,同时也是一种圣物。〔24〕〔P131〕这种直接来源于藏传佛教,本源于印度佛教的“擦擦”,也是中印两国间文化交流的结果。

从上述几方面可以看出,西夏京畿成为西夏王朝佛教文化的中心区,同时又是藏传佛教东传的桥梁。由河西走廊东渐而至的藏传佛教对西夏京畿的建筑、绘画、婚姻家庭等方面产生极大影响。《黑鞑事略》载:“西夏国俗,自其主以下,皆敬事国师,凡有女子必先荐于国师,而后敢适人。”〔25〕〔P18〕元人马祖常《河西歌》曰:“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茜根染衣光如霞,却召瞿昙作夫婿。”

当然,佛教文化在西夏京畿的生根发展、影响变通过程的每个细节尚有待于进一步揭示,但西夏京畿的佛教文化遗存无疑给当代宁夏西夏历史研讨、宗教文化旅游、开发生态建设留下了大量的资源宝库。

## 参考文献：

- [1] 吴广成(著), 龚世俊等(校). 西夏书事校证(卷10) [M].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5.
- [2] 聂鸿音. 大度民寺考[J]. 民族研究, 2003, (4).
- [3] 克恰诺夫, 李范文, 罗矛昆. 圣立义海[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5.
- [4] 赞宁. 宋高僧传(卷二一, 二二, 二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5]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5)[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6] 史金波. 西夏佛教史略[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8.
- [7] 胡汝砺(编), 管律(重修), 陈明猷(校勘). 嘉靖宁夏新志(卷二)[Z].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2.
- [8] 脱脱. 金史(卷60)[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9] 史金波. 西夏佛教新探[J]. 宁夏社会科学, 2001, (5).
- [10] 宁夏文管会, 等. 宁夏贺兰县拜寺口双塔勘测维修简报[J]. 文物, 1991, (8).
- [11] 牛达生. 西夏活字印刷研究[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4.
- [12] 史金波. 西夏“秦晋国王”考论[J]. 宁夏社会科学, 1987, (3).
- [13]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等. 宁夏贺兰县拜寺口北寺塔群遗址的清理[J]. 考古, 2002, (8).
- [14]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拜寺沟西夏方塔[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 [15] 宁夏文管会, 等. 宁夏贺兰县宏佛塔清理简报[J]. 文物, 1991, (8).
- [16] 宁夏文管会, 等. 宁夏青铜峡市108塔清理维修简报[J]. 文物, 1991, (8).
- [17] 牛达生, 许成. 贺兰山文物古迹考察与研究[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8.
- [18] 谢继胜. 贺兰山山嘴沟石窟西夏壁画的初步分析[A]. 第二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C]. 银川: 宁夏社会科学院, 2005.
- [19] 李祥石, 朱存世. 贺兰山与北山岩画[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3.
- [20] 陈庆英. 西夏及元代藏传佛教经典的汉译本—简论《大乘要道密集》《萨迦道果新编》[J]. 西藏大学学报, 2005, (2).
- [21] 李际宁. 关于“西夏刊汉文版大藏经”[J]. 文献, 2000, (1).
- [22] 汪一鸣. 饮汗城城址考证[J]. 宁夏社会科学, 1983, (1).
- [23] 牛达生. 西夏刻书印刷事业概述[J]. 宁夏大学学报, 1999, (3).
- [24] 韩小忙, 等. 西夏美术史[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1.
- [25] 彭大雅(撰), 徐霆(疏证). 黑鞑事略[M]. 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177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Buddhist Culture around the Capital Suburbs of the West Xia Dynasty

YANG Zhi-gao

(Center for the West Xia Research of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Ningxia 750021)

**Abstract:** The West Xia Dynasty is characterized with Buddhism and its capital suburbs are considered as center for Buddhist culture, and a great variety of Buddhist cultural relics are remained in these areas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est Xia Reign and the following two hundred years or more. The cultural interests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have bot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for the basic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culture of the Dangxiang Minority reign. Because of the initiation and involvement by the imperial members and the Buddhists, the suburbs have become a center for printing Buddhist documents or other scriptures. In case of a demand for the Tripitaka and Buddhist services, the capital suburbs have become central places for the imperial temples to be built there. Various intricate relics and texts have all represented the artistic values of Buddhist culture of the suburbs in the West Xia Dynasty.

**Key Words:** Helan Mountains of Xingqing Government Office of the West Xia Dynasty; measures of maintaining Buddhist culture; translation and engraving of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the imperial temples; cultural artistic values

[责任编辑 方建春]